

诗

诗经讲演录

灵魂的诗与诗的灵魂

姜广辉 邱梦艳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诗经讲演录

灵魂的诗与诗的灵魂

姜广辉 邱梦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经讲演录: 灵魂的诗与诗的灵魂 / 姜广辉, 邱梦艳著.
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6. 5
ISBN 978 - 7 - 5161 - 5963 - 7

I. ①诗… II. ①姜…②邱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通俗读物
IV. ①I207. 222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1271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罗 莉
特约编辑 孙少华
责任校对 李 林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8. 25
插 页 2
字 数 242 千字
定 价 69. 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开头语：《诗经》诠释小史

姜广辉

一 《诗》的原始性和文学性

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是中国先秦时代最早的几部文献。这些本是社会的公共文本，在诸子百家中，只有儒家愿意全面继承它，并对之加以整理和阐释，于是它也就成了儒家的经典，被后世称为“六经”^①。到了汉代，因为社会尊经的缘故，这些文献名称的后面普遍缀了一个“经”字，如称《诗》为《诗经》、称《易》为《易经》，等等。虽然在先秦时，还没有《诗经》这样的名称，但为了口语表达的方便，我们还是以《诗经》称之，这一点请大家能够理解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。“诗歌”二字是个现代名词，但用在古代却是很恰当的，因为《诗经》中的诗篇都是可以歌唱的。《诗经》可以说是一部史诗，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西周和春秋初中期人们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。18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家希伯神父（LePibot）在其所著《古代中国文化论》中说：“《诗经》的篇什如此优美和谐，贯串

^① 汉代《乐经》失传，只剩了五经，然而后世有时也会用“六经”作为儒家经典的代称。“六经”是虚称，“五经”是实称。

其中的是古老的高尚而亲切的情调，表现的风俗画面是如此纯朴和独特，足可与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相媲美。”^① 西周和春秋初期虽然也有过社会乱离的历史，但总体上说，那时人们的生活颇有田园诗般的味道。在我们看来，《诗经》中的诗篇，大部分为无名氏所作，或者是一种集体式的创作，其功用是社会共同体成员用来相互娱情，或者在宗庙中娱神的。汉代儒者硬说《诗经》篇篇都是美某人、刺某人的，有许多穿凿附会的成分。

中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到今天仍有“对歌”的习俗^②，大概《诗经》时代普遍具有此种风俗。《诗经》中的风谣一类诗很可能是通过这种“对歌”形式传播的。这种“对歌”有时是恋人的互诉衷情，也有时是集体娱乐的相互调笑。它直抒胸臆，活泼清新，感情真挚，充满生命的活力。像《将仲子》：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墙，无折我树桑。岂敢爱之？畏我诸兄；仲可怀也，诸兄之言亦可畏也。”^③ 这种偷情诗歌能在上古社会共同体中传唱、流传，最后被王朝采诗官采集到，经过整理后，又被上层社会接纳，并加以传习。如果没有集体娱乐“对歌”调笑的形式，这样的诗是不会在最初流传的；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宽容的人际关系和共同的审美情趣，王朝采诗官也不会将之宣之于大庭广众之间的。

《诗经》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“样态”。他们的生活是具体的、琐碎的，乃至重复的，几乎是无须记述的，但这些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们精神是那样的鲜活，它以一种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并且一直被传诵，被解释，而由此，这种生活乃至具有此生活的人们精神被“诗化”了，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为“诗化人学”。尽管汉

① 转引自周发祥《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》，见《文学评论》1993年第6期。

② 笔者曾在贵州生活十年，亲身感受到苗族、布依族“对歌”的魅力。“对歌”有围坐的形式，也有相距较远对唱的形式。相距远而要人听清，则句式不宜长。

③ 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。

代以后曾有一个“礼化诗学”的过程，但是“诗化人学”的传统一直借助文学的形式被继承和发展，也就是说，后世人们一直用诗来唱颂自己的生活。

五经中的其他四经如《易经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仪礼》都是出自圣贤的制作删述，记载圣君贤相、大贤君子的言行事功，只有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所反映的是里巷田野、匹夫匹妇的悲欢怨怒之言，甚至还有偷情“淫奔”之事，这部分内容怎么可以与帝王圣贤的格言大训并列为经呢？通观历史，中国可称得上诗的国度，尤其是唐诗更发展到一种巅峰的程度。但人们仍称《诗经》为经，而不称后世的任何诗篇（包括唐诗）为经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由于语言的变迁，《诗经》的大部分诗今天读起来已不甚能懂。然将它翻译成现代语言，我们会发现，其思想之鲜活，几乎与我们是零距离的。由此我们认为诗经是灵魂之诗，唯其是灵魂之诗，它才体现诗之灵魂。在我们看来，《诗经》的深层的魅力，在于它是一部情感母题的结集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篇说：“诗道志，故长于质。”苏舆《春秋繁露义证》解释说：“诗言志，志不可伪，故曰质。”志，指人们的情志；质，指真实自然。《诗经》所反映的正是上古先民真实心声的自然流露，体现他们对于真、善、美的热切追求。与后世的诗歌相比，《诗经》没有过多强调技巧、格律，也没有刻意追求绮丽的辞藻，但它却完好地保留了诗的原始抒情本质。那时的人们，动于心而发于口，天机自动，天籁自鸣，他们所抒发的情感，无论喜怒哀乐，都是那样的真实自然，没有一丝矫揉造作。而抒发情感正是诗歌的本质。诗人沈方在《诗歌的原始样式》一文中提出：“真正的诗歌，就是原始样式的诗歌”，“只有回到诗歌的原始，才能得到本质的诗歌”。^① 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。

^① 《诗刊》2001年第8期。

《诗经》并未因为其草创而显得粗犷、鄙野，相反，在很多方面其艺术造诣都是后世所无法企及的。《诗经》没有确定的作者，它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经过许多高手的加工锤炼，以至篇篇精致无比。例如对爱情的描写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……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”^①又如对远征士卒内心世界的描写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！”又如对女性美的描写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^②又如对孝子思亲之情的描写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”^③又如对感恩之心的描写：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”^④等等，皆为千古佳句。它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，所以宋代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卷上评论魏晋诗歌说：“魏曹植诗出于《国风》。晋阮籍诗出于《小雅》，其余递相祖袭，虽各有师承，而去《风》《雅》犹未远也。”宋许颢《彦周诗话》述苏东坡教人作诗之法说：“熟读《毛诗·国风》与《离骚》，曲折尽在是矣。”许颢并且评论说：“仆尝以为此语太高，后年齿益长，乃知东坡先生之善诱也。”

《诗经》虽然从一言到八言几乎都有，但基本是以四言为主。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从四言诗到五言诗，再到七言诗的发展主线。《诗经》之所以以四言为主，可能有两个原因，一是由于当时语言习惯的原因。上古人说话简洁，词汇多以单音节为主。后世词汇发展，多以双音节为主。今人读《诗经》觉得特别古奥，然而当时人一听就能懂的。二是由于《诗经》中的诗最初是用来歌唱的，歌唱有音节的需要，四言应该是适应音节表达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。秦汉以后，也有写四言诗

① 《诗经·国风·周南·关雎》。

② 《诗经·国风·卫风·硕人》。

③ 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。

④ 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。

的，但多是写铭、颂之类。后世可能因为语言习惯的变化，人们已经不善于用四言诗来抒情表意了。所以，宋代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卷一说：“诗四言尤难，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。”由于后代人缺乏写好四言诗的体会，加上经学家更重视《诗经》的道德教化意义，所以对《诗经》中四言诗的美学规律，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和总结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

二 《诗经》的内在价值

各民族在文明初启之时，差不多都有其民族史诗一类的东西。史诗因为有故事性，又是韵文，即使在没有文字之时，也可以通过传唱来流传。因而这种史诗也就成了该民族最初的知识、文化，乃至价值观的载体。当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评论荷马史诗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时说：“那时的时尚是，一个人必须诉诸于荷马才能证明自己的全部知识（无论属于什么领域）的正确性，正如基督教作家诉诸《圣经》以证实自己知识的正确性一样。”《诗经》在中国上古时期也有类似的情形。荷马是一位盲人，而当时传唱、演奏《诗经》的乐师——瞽者们，都是盲人。这些瞽者在当时，不仅是音乐教育的掌管者，同时也是知识文化的掌管者，甚至是知“天道”者，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单襄公之语说：“吾非瞽史，焉知天道？”这是说作为掌管诗乐之官的——瞽，当时被认为是知“天道”的人。

所以，尽管先秦时期还不是经学时期，像《诗》这类文献已经具有了经典的地位。人们在言谈之间，动辄说“《诗》云”如何如何，而在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场合，卿大夫之间能否恰当地引诗、赋诗，也是考验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外交能力的重要标志。所以孔子说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

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孔子认为学《诗》的人事理通达，温柔敦厚，善于言谈，这样的人国君会授之以政事，也可以作为使臣独立从事外交活动，不学《诗》的人，连谈话的资本都没有。孔子之后，儒者著书动辄引用《诗经》，像《大学》两千字的文献，有十二处引用《诗经》，《中庸》一篇有十六处引用《诗经》，《缙衣》一篇有二十二处（有二十一处引用《诗经》原文，有一处引用逸诗）引用《诗经》。由于《诗经》所具有的这种权威性，所以古代儒家一直重视阐释它所蕴含的价值观，至少从先秦孔子到汉代儒者是这样。汉代《诗经》有鲁诗、齐诗、韩诗、毛诗四家，至《毛诗序》篇篇讲美刺而达于极致。由于儒者的一代一代的阐释，给《诗经》附加和递增了许多的价值和意义。《诗经》因而变成了一部承载价值和意义的母体文本。

三 《孔子诗论》对《诗经》的认识

十年前，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一）》出版，这是新近发现的一批战国竹简文献，其中收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孔门论诗文献——《孔子诗论》。这篇文献现有完、残简 29 支，共约 1006 字。因为这篇简文连缀拼合有很大的难度，许多学者都参与了拼合整理，因而有若干不同的版本。我因为当时正研究经学，觉得这篇简文对诗经学非常重要，所以花了极大的功夫参与研究。我自己也作出一个文本，这个文本吸收了许多学者的重要意见，加上我自己的原创，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文本之一，后来被美国学术刊物翻译成英文发表。据我所知，这也是中国学者关于《孔子诗论》整理研究唯一被译成英文的文本。

几年前我在岳麓书院开《孔子诗论》课，讲了一个学期，我也发表过许多篇相关的文章，这里不想重复，也不拟多讲。这里只想谈两点新的认识。

第一，《孔子诗论》帮助我们确认《诗经》到底分为几个部分。传统的意见认为，《诗经》分为三大部分：风（十五国风）、雅（小雅、大雅）、颂（周颂、鲁颂、商颂）。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。但宋代程大昌作《诗论》十七篇，专门论述《诗经》原本分为南、雅、颂三大部分，他认为《诗经》中的“周南”和“召南”的“南”字，不是表示地域和方位，而是表示一种“乐”名，南和雅、颂一样，都是乐名。其他十三国诗，不入乐，也无“国风”之名。“国风”之名是汉儒起的。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。不过传统儒者并不依从程大昌的说法。到了近代，梁启超提出《诗经》应分为南、风、雅、颂四大部分，其说暗袭程大昌的说法，而又有许多新的论证，文章写得非常雄辩。一些学者看了他的文章，在认识上发生了动摇，比如蒋伯潜、蒋祖诒父子合著的《经与经学》一书就采用了他的说法。那么，《诗经》到底分为哪几部分呢？读了《孔子诗论》，我们就有了答案。我们不妨录下其中一段：

《颂》，寡德也，多言后。其乐安而迟，其歌绅而藐，其思深而远，至矣！《大夏（雅）》，盛德也，多言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【[K]】矣！《小夏（雅）》，【[J]德】也，多言难而怨怼者也，衰矣！小矣！《邦风》，其内（入）物也博，观人俗焉，大金（验）材（在）焉。其言文，其声善。

《孔子诗论》明确将《诗经》分为风、雅（小雅、大雅）、颂三大部分，那时不称《国风》，而称《邦风》，那是因为古来原本称《邦风》，汉以后因为犯了汉高祖刘邦的名讳，才改为《国风》的。所以今天，我们可以不受程大昌、梁启超的困扰，很有把握地说：《诗经》分为风、雅（小雅、大雅）、颂三大部分。这虽说是一个常识，但它是一

个正确的常识。由于人们喜爱标新立异，许多时候要维护一个正确的常识意见，也很不容易。

第二，孔子的解《诗》态度。汉儒所塑造的孔子的形象是一位通天教主，张口就是道德教化，好像孔子出生的使命就是来教训人的。但我们在《孔子诗论》中所见到的孔子并不是这样，而是显示一种谦恭的学习、研究《诗经》的态度。我们不妨再录一段于下：

孔子曰：吾以《葛覃》得祇初之诗，民性固然，见其美，必欲反其本，夫葛之见歌也，则以缔络之故也。后稷之见贵也，则以文、武之德也。吾以《甘棠》得宗庙之敬，民性固然，甚贵其人，必敬其位，悦其人，必好其所为，恶其人者亦然。【吾以《木瓜》得】币帛之不可去也，民性固然，其隐志必有以揄也。其言有所载而后纳，或前之而后交，人不可干也。^①

这段话比较晦涩，将它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：孔子说：我从《葛覃》的诗中得到崇敬本初的诗意，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，看到了织物的华美，一定会去了解织物的原料。葛草之所以被歌咏，是因为缔和络织物的缘故。后稷之所以被人尊重，是因为（他的后人）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行。我从《甘棠》的诗中得到宗庙之敬的道理，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，如果特别尊重那个人，必然敬重他曾经停留的位置。喜欢那个人，一定也喜欢那人所有的作为。（反过来），厌恶那个人也是这样（一定厌恶那人所有的作为）。（我从《木瓜》的诗中）得到币帛之礼不可去除的道理。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，他们内心的意愿必须有表达的方式。他希望结交的心意要先有礼物的承载传达而后再去拜见。或直接前去拜见而后送上礼物。总之，与人结交是不可没有礼物的。

^① 见本书附录。

孔子通过学习《诗经》来重新认识民众的习俗和性情，以便调整自己的处事方式。我们从这些话中看到了一个敏而好学、通达事理、平易近人的孔子。这与《毛诗序》将《诗经》篇篇都看作“美某人”“刺某人”的认知方式大相径庭。

四 鲁诗管窥

西汉今文经学《诗经》三家：鲁诗、齐诗、韩诗。鲁诗传自鲁国人申培，齐诗传自齐国人轅固生，这两个《诗经》学派皆以国命名。韩诗传自燕国人韩婴，此一《诗经》学派以传经人的姓氏命名。其后又出现了属于古文经学的《毛诗》，传自大毛公和小毛公。大毛公名毛亨，小毛公名毛萇。《毛诗》也是以传经人的姓氏命名的。《毛诗》出而三家诗渐亡，齐诗亡于魏，鲁诗亡于西晋，韩诗亡于两宋之间。后世哀辑三家诗遗佚之文，齐诗存者绝少，鲁诗存者也不多。有一句成语说：“管中窥豹，只见一斑。”我们使用非常有限的一点材料，在以下三节中略微介绍一下鲁诗、齐诗和韩诗。

西汉鲁、齐、韩三家诗中，鲁诗最早出。论其渊源可以上溯至荀子。荀子当年传经，弟子中有浮邱伯得到《诗经》传授。汉高祖刘邦有个小弟弟叫刘交（即是后来的楚元王），年少时与申培等人一同受《诗经》于浮邱伯。刘交一直喜欢《诗经》，他的几个儿子都从他学《诗经》。汉兴，高祖到鲁地时，年轻的申培曾随老师一同晋见。汉文帝时闻听申公治《诗》最精，聘为博士。后申公归乡教授，作有《诗传》，成为鲁诗传授的源头。汉武帝尊儒，曾派官员重礼聘申公到长安京城。此时申公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接他的官员怕他经受不住途中的颠簸，将车轮裹上蒲草。“安车蒲轮”，这在后世被传为美谈。因为申公年纪太大，身体又有病，到长安不久后又回到家乡，数年后病卒。其弟

子孔安国等十余人皆为博士。其再传弟子韦贤为汉昭帝的《诗经》老师，汉宣帝时位至丞相，其子韦玄成亦治鲁诗，在汉元帝时位至丞相。所以当时曾流传这样一句谚语：“遗子黄金满籝，不如一经。”鲁诗中的另有一位后学叫王式（字翁思），为昌邑王的老师。汉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为天子，不久因行淫乱被废，其旧臣未曾上谏书规劝者皆被诛死。治事使者曾责问王式，为什么不上谏书规劝昌邑王，王式回答：“臣以三百五篇当谏书，所以无谏书。”使者上报，得以免死论处。所以，汉儒以“三百五篇当谏书”，也被后世传为美谈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汉兴，鲁申公为《诗训故》，而齐辕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，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”

申培鲁诗一脉自西晋失传，至今已很少有遗说传世。倒是楚元王一脉，世传其学，因与申公同出于一师，所以这一脉诗学也被后世当作鲁诗对待。刘向是楚元王四世孙，与其子刘歆皆为汉代大儒。刘向属通儒，鲁诗之外，亦习韩诗，但主流仍属鲁诗则无疑义。刘向有很多部著作，如《新序》《说苑》《列女传》等，其书喜引《诗》论事，从中透出鲁诗一脉对《诗经》的理解。

刘向引《诗》论事，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、道德教化的意图。他的《新序》等书中所讲的多是与儒学教化相关的历史掌故，但只讲这些历史掌故还不够，差不多他在讲述每个历史掌故之后，都要引上一两句《诗经》的诗句，似乎不用这些诗句来印证，这些历史掌故便达不到真理的高度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刘向已经将《诗经》看作真理的化身。我们检索刘向在这些书中所讲的为君之道、为臣之道等，发现其中一些内容即使在现在来看，仍然有发人深思的启迪意义。今举两例：

首先，来看他讲为君之道的例子，刘向《新序》卷四载：

哀公问孔子曰：“寡人生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寡人未尝知危也。”孔子避席曰：“丘闻之：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将安不至矣！夫执国之柄，履民之上，慎乎如以腐索御奔马，《易》曰：‘履虎尾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如履薄冰’，不亦危乎！”哀公再拜曰：“寡人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文中所引《诗经》“如履薄冰”之句出自《小雅》中的《小旻》和《小宛》。按传统的解释，这是大夫讽刺昏君（厉王或幽王）的作品，当时政治坏乱，小人当道，谋事邪僻，君臣离散，君子遭乱而表忧惧。所以《小旻》第六章说：“不敢暴虎，不敢冯河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它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《小宛》第六章说：“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，惴惴小心，如临于谷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”“如临深渊”，是唯恐坠落。“如履薄冰”，是唯恐自陷。这两首诗都在讲这样一个道理：君主昏庸，不明事理，就会导致政治坏乱，引发社会的危机。因为当时之人包括鲁哀公，对《诗经》中的这两首诗比较了解，当孔子引出“如履薄冰”的诗句时，鲁哀公自然明白孔子所隐含的意思，即作为人君，不能走周厉王和周幽王的路。所以鲁哀公拜谢孔子说：“寡人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再来看刘向所讲的为臣之道，其所著《列女传》卷一载有一则“齐田稷母”的故事，讲这个伟大的母亲如何教育她的做大官的儿子保持廉洁品质：田稷担任齐宣王的相国，收受了下属官吏贿赂给他的大量财物。田稷要把这些财物送给自己的母亲。母亲说：“你出任相国三年，俸禄不应该有这么多，这些财物恐怕是别人贿赂你的吧。”田稷回答说：“确实是收受属下的。”母亲说：“我听说，士大夫要洁身自好，不能随便收受人家的东西。应该诚心诚意地做事，不弄虚作假。不符合道义的

事情，不要在心里盘算。不合理的利益，不要带回家里。应该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。当今国君给你高官厚禄，你应该以忠诚报答国君才是。臣子辅佐君主，就像儿子孝敬父亲。尽心竭力，忠诚不贰，效力国家，廉洁公正，这样才不会有祸患。而你却与此相反，做臣子不忠，就等于做儿子不孝。不义的财物，不是我应该拥有的，不孝顺的儿子，不是我的儿子。你走吧。”田稷羞愧地走出家门，退还了财物，并主动向齐宣王认罪，请求处罪。齐宣王听后，对田稷母亲深明大义大加赞赏，于是免除了田稷的罪责，并且拿出国家的钱财奖赏给田稷的母亲。

刘向讲完这个故事，然后评论说：“君子谓稷母廉而有化。《诗》曰：‘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’无功而食禄，不为也。况于受金乎？”刘向引用的诗句出自《魏风·伐檀》。此诗共三章，其首章说：“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。河水清且涟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貆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这是《诗经》中有名的讽刺贪官的诗。“素餐”的意思，就是食君之禄，不任君之事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“白吃饭，不干事”。刘向的意思是说，无功而食禄，已经是不对的，更何况收受下属的贿赂呢！刘向用这个故事加上《诗经》的警句，一方面警醒官吏要廉洁奉公，一方面要天下做父母的知道应该怎样教育自己的儿子，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向人们强调《诗经》的义理价值。

五 齐诗管窥

齐诗出自轅固生。轅固生是一个很有风骨的人，关于他的故事颇有传奇的色彩。他在汉景帝时为博士，曾经在汉景帝面前与黄生争论“汤武革命”的问题。当时黄生提出，汤武并不是革命，乃是一种篡弑。这种意见违背了儒家经典的观点，但却有明显对现政权表示永远效忠的意

味。轅固生听后立即反驳他说，桀纣暴虐，天下的民心皆归汤武，汤武按照人民的意愿诛杀桀纣，桀纣统治下的人民不为桀纣所使，都归附了汤武，汤武不得已而自立为王，这难道不是革命吗？黄生则提出，帽子再破，还是要戴在头上。鞋再新还是穿在脚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有上下之分。桀纣虽然失道，但毕竟是君上，汤武虽然圣明，毕竟是臣下。君主有过失，臣下不是加以匡正，以尊天子，反而因为他有过失诛杀他，取而代之，这难道不是篡弑吗？轅固生回答说，若非要这样说，那我们的高祖皇帝取代秦皇，即天子之位，那是对呢还是错呢？问题讨论到这里颇为僵持。汉景帝很有智慧，他说：马肝有毒，食肉不食马肝，不能说不知味。学者不讲汤武革命，不算愚。隐含的意思是说，“汤武革命”这个议题对现政权而言是一剂毒药，今后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

还有一次，窦太后（即汉文帝的皇后）因为喜好黄老之书，向轅固生请教黄老之书中的问题。轅固生回答说：这是家人们讨论的问题，在那时“家人”是家中童仆的意思，若翻译成现代语言，那就等于说“这是老妈子谈论的问题”。所以窦太后听后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安得司空城旦书乎？”这是当时的原话，后世人已经不懂了，误以为“司空城旦书”是法律条文之书。据清人惠士奇的解释，“司空城旦”的意思是司空官员管制下的服役者，简单说，就是那个时代的“劳改犯”^①。儒家重视思想教育，所以窦太后反骂儒家之书是“司空城旦书”，是劳改犯们应该读的书。轅固生因为一句“大不敬”的话，闯下了大祸。事情到此并没有完，窦太后罚轅固生到猪圈里去刺猪，这无非是想让儒者出乖露丑。汉景帝知道是太后发怒，但轅固生直言并无罪，所以给了轅固

^① 惠士奇解释《周礼》“司圜”说：“司圜收教罢民，凡害人者弗使冠饰，而加明刑焉。……罢民犹罢士，亦曰惰游。……罢民役之司空。犹汉之城旦，黥面曰墨。墨而役之者，黥为城旦。不墨而役之者，完为城旦。”（《礼说》卷十二）

生一把锋利的短剑，辕固生一剑便刺中猪的心脏，猪应手而倒，窦太后默然，不再加罪于他。汉景帝欣赏辕固生的清廉正直，封他为清河太傅，辕固生因为有病，没有去就职。汉武帝初即位，以征贤良的名义征召天下儒者，此时辕固生已经九十多岁。辕固生风骨铮铮，儒者都很忌惮他。当时公孙弘也在征召之列，辕固生对他说：“公孙子，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。”公孙弘后来做了丞相，但也正是有“曲学阿世”的问题。可能辕固生早就看出了公孙弘的弱点。辕固生的风骨及其关于“汤武革命”的观点显然是继承了子思、孟子一脉的传统。他的这一传统也被后世齐诗一派所继承，比如翼奉的“四始五际”之说虽然披上了术数的外衣，但骨子里仍是关于政治“革命”可能性的理论。

翼奉是辕固生的三传弟子，他提出了一个齐诗“四始五际”的理论，这个理论记载在《诗纬·泛历枢》中：

《大明》在亥，水始也。《四牡》在寅，木始也。《嘉鱼》在巳，火始也。《鸿雁》在申，金始也。

卯，《天保》也，酉，《祈父》也。午，《采芑》也。亥，《大明》也。然则亥为革命，一际也。亥又为天门，出入候听，二际也。卯为阴阳交际，三际也。午为阳谢阴兴，四际也。酉为阴盛阳微，五际也。

卯酉之际为革政，午亥之际为革命。神在天门，出入候听。

汉儒喜欢用阴阳五行、天干地支等建构理论模型，我们顺着这个思路，便可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我们可以画一个圆周，将其分为十二等份，按顺时针顺序用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十二地支来标示它，如果在下面中间的部分标“子”，那上面中间的部分就是“午”，左面中间的部分就是“卯”，右面中间的部分就是